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主题文章

## 加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必然

何德旭

新近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sup>①</sup>,全面、准确、系统、深入地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以平实精练的语言、严谨科学的结构、生动朴实的文风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是我们系统学习、准确理解、深入研究和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本文仅就其中“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谈点认识和体会。

### 一、充分认识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大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加强党的领导。他指出:“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sup>②</sup>他在多个场合强调党的领导要在经济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和政治高度统一的辩证关系。在 201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对于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2017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在 2017 年 7 月 14 日至 15 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关于加强党对金融工作集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2 年版。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3 页。

中统一领导的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金融发展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金融领域的深化和具体化,是党在金融工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调的是党中央在金融工作中拥有领导核心地位,总揽中国金融发展全局,把控金融领域政治方向;制定金融发展战略,规划金融发展路径,主导金融发展方向;统筹中央与地方金融工作,统领金融监管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管控金融领域组织建设;协调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优化金融政策,统一金融领域思想,确保各项经济金融政策落实。

当然,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并不是包办一切,而是要管大事、议大事、谋大事、做大事,做好金融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发挥“总指挥”的作用。

近年来,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不断健全,为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金融工作提供了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加强,对推动金融改革与发展、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保障金融稳定与安全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中央政治局经常研究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重大金融事项;中央财经委员会及时研究金融发展重大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及时研究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比如,为应对金融危机、引领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再比如,建立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制度,从1997年开始,党中央每5年举行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结合经济发展状况与金融体系重大事项做出战略部署,目前已经召开了5次,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方针、重大战略、重大决策、重大改革、重大任务均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前期部署密切相关。

## 二、从历史和现实看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前,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之一。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sup>①</sup>新中国成立后,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sup>②</sup>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历史逻辑性和现实必然性的有机统一。为了确保中国金融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特色,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坚持并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金融领域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第一,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既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手段,也是其他领域建设的根基,是全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写入党章,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建设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成为发展速度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并以其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助推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金融业联结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牵一发而动全身。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业是否安全、稳健、高效运行,关系到国民经济是否能够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经济建设的成效。金融安全既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一极,又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为保证金融业健康持续发展、为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仅仅依靠利润导向的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难以实现,还需要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这就需要将金融工作纳入党执政兴国的总盘子,发挥党在金融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第二,党在领导中国金融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根植于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发展中国特色金融需要党的领导。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国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立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和金融运行模式。其基本特点是扎根中国本土、立足中国国情、注重实践、讲求实效,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修正、完善和发展。其重要表现是始终注重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始终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始终注重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始终注重金融创新、始终注重金融风险防控。实践表明,40多年来,金融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经济结构调整、消除贫困、保障民生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多次全球经济金融动荡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金融始终能够保持稳定,对于世界经济及早恢复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充分证明党领导的金融发展道路和金融运行模式的科学性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性。

第三,应对金融工作复杂局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需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工作仍将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和严峻的风险挑战。全球疫情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发达国家宏观政策变化冲击,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金融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地方政府收支矛盾加大、企业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家庭杠杆率提高、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仍然需要关注。另外,持续推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的对外开放,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应对复杂局面、防控重大风险和维护金融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强化党中央在金融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从全局出发把控内外部各种风险因素,制定贯通内外的应对和防范措施,协调相关各方一致行动。

第四,金融进入新发展阶段,更加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科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全球领先,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金融难题,已经建立起了适合国情和自身发展规律的特色金融。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金融发展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尽快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我国已经成功建立了适合自身特点的金融体制,找到了正确的金融发展道路,未来的金融发展必然是在已有的金融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与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达成更高发展目标。金融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

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金融已有的深厚基础是在党的领导下打下的,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我国金融更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努力承担和完成新的使命。

### 三、必须继续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解决中国发展和安全问题的最大政治优势和保障。在新发展阶段,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提升我国经济实力,要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就必须继续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第一,提高党领导金融工作的能力。世界万物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金融发展,党的领导能力需要随之提升。邓小平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sup>①</sup>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复杂,金融改革发展任务艰巨,金融市场业务创新变化快,加上金融工作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自然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自觉补充知识,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不断提高经济工作领导能力和水平。”<sup>②</sup>“领导干部提高领导经济工作能力不是只懂一点经济学知识、科学知识就够了,还必须学习历史知识、厚植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sup>③</sup>一是把握金融发展方向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动摇。要引导和激励金融市场主体或金融机构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在此前提下,也让金融机构获得合理收益,以持续为经济发展服务。党在领导金融工作中,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金融业发展方向,使其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要在金融机构偏离发展方向时,尊重金融业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律,科学引导金融机构回归正确的发展道路。二是谋划金融发展大局的能力。谋划大局是党领导金融工作的重要方面,面对国内外严峻复杂的局面,党在领导金融工作过程中,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认识大局、服从大局、维护大局。中国金融发展的大局就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国内,金融业与各行各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之间、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金融机构之间都有各自的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金融业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因此,党领导金融工作应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各级各类金融管理部门职能,协调好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运作,弱化部门利益,形成合力,降低金融风险,在保持金融行业安全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发展。党在领导金融工作中谋划大局,还应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在金融上,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需求与金融发展地域、人群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即金融供给不能有效满足金融需求的问题。这就要促进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合作,减少无序竞争,丰富金融产品;同时,实现金融有序开放,扩大金融机构发展空间,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三是制定金融政策的能力。制定金融及相关政策是落实把握方向、谋划大局的具体手段。要通过广泛调查、深入分析和判断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全面了解各方利益诉求,使金融政策符合实际、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2月1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切实可行。要加强制定金融政策的制度化建设,完善金融决策程序,增强法治意识,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随形势的变化及时、灵活调整金融政策,应对和解决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四是推进金融改革的能力。改革是我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解决金融发展问题的主要手段。党领导金融工作需要不断提高推进金融改革的能力,始终坚守改革促发展的信念。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科学确定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推出新的改革举措;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强化对金融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与推广;要营造良好的金融创新氛围,激发金融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第二,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为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金融系统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实现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就需要有落地的抓手和组织保障。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保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一是做好金融系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金融系统有其自身的行业特点,金融从业人员有其特有的行为规范,金融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应针对金融工作特点有的放矢。要引导金融系统员工讲政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按经济、金融规律办事。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设计符合金融工作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强化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建设,实现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和常规化。二是做好金融系统党的组织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系统党的建设的组织保障。加强金融系统党的组织工作,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健全金融系统党的组织机构,完善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直接领导;提高金融系统组织部门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使其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德才兼备;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和联系。三是加强金融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由于特殊的工作内容和性质,金融业是容易滋生腐败的行业。做好金融系统党风廉政、防腐防腐工作是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要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制度、促进金融治理、推动金融发展贯通起来;要依靠发扬民主、健全法制预防和治理金融系统腐败问题;要实现金融系统党风廉政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有针对性地补齐制度短板,通过体制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强化监督约束机制;要加强金融纪检部门建设,建立专业的金融反腐人才队伍。

第三,不断健全和完善金融法律制度,提高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必须“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sup>①</sup>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增加法治观念,依法调控和治理金融。因此,要继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保证有法可依,及时修订过时的法律条款,做到与时俱进。在实际工作中,要破除单纯运用行政手段管理金融业务的旧思维,改变用超越法律法规的手段和政策来抓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推动发展的办法,坚决打击寻租行为;要提升法律意识,“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依法办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sup>②</sup>要运用法律工具解决金融发展中的各种利益问题,提高金融监管的法治化水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①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2月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22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2月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页。

# 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贡献

裴长洪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开放发展理念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十八大之前党和国家有关对外开放的论述相比,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新的理论深度、新的历史站位以及认识和把握未来发展规律的重要特点。

##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总结论证了经济全球化

在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个预言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站在时代高度审视世界历史,“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论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他指出,“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虽然是冷战结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他把经济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世界各国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形成两大阵营,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与之对应,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在列强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向苏联“一边倒”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文革”时期基本同世界隔绝;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sup>②</sup> 习近平总书记的分析和总结,澄清了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认识上的误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7—20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0—211页。

## 二、对“逆经济全球化”思潮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2014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sup>①</sup>2016 年 11 月,他进而阐释“经济全球化进入阶段性调整期,质疑者有之,徘徊者有之。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sup>②</sup>2016 年 11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sup>③</sup>2017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sup>④</sup>同时,一分为二地分析经济全球化,它又是一把双刃剑:肯定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并不是说它一切都很美满。即便在获得经济全球化巨大收益的中国,也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许多问题。它有许多负面效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sup>⑤</sup>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2016 年 11 月 19 日,他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我们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sup>⑥</sup>“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sup>⑦</sup>,这种经济全球化新理念进一步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表述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sup>⑧</sup>这就要求我们转换思路,由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引领者。2014 年 12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只是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要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sup>⑨</sup>201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 年前甚至 15 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sup>⑩</sup>2016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sup>⑪</sup>

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两种历史观矛盾,体现在对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历史趋势的最终判断上。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又为全球阻隔和保持距离提供了客观条件,世界进入“逆全球化”的暂时倒退阶段。在这个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历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42 页。

② 习近平:《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2016 年 11 月 20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11 月 22 日。

③ 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6 年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11 月 21 日。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77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43 页。

⑥ 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6 年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11 月 21 日。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43 页。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6 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95 页。

⑩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 年 1 月 18 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 22 页。

⑪ 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6 年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11 月 21 日。

史正确的一边,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方向发展。这两种历史观深刻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再一次较量。

### 三、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一百年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与发达国家国际垄断资本的阶级矛盾运动得出的科学判断。

第一,中国经济崛起与世界各国利益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生产力快速发展与世界经济(世界生产力)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这一方面壮大了世界和平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中国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世界市场的矛盾。在现象上表现为中国与某些大国或发展中国家在市场、资源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增多,成为百年未遇的希望与挑战。

第二,文明单一与文明多样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开放型的经济基础与世界旧有的意识形态的矛盾。现代化文明和发展道路从单一美国模式转变为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多种文明模式。美国梦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唯一途径,这种百年未有的变化对于美国右翼政客和知识精英来说,很刺激、很震撼,也很受伤,从而激化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与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挑动了民粹主义的意识和骚乱,进一步激化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矛盾。

第三,新一代科技优势的竞争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科技发展要求世界合作开放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技术的矛盾,是中国生产力与旧的世界生产关系矛盾的新形式。现在,中国的科技力量日益壮大,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参与世界竞争,走在了世界科技力量的第一方阵,与一些西方大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角逐,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奇观,同时也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打压的对象。

第四,全球治理向何处去的两种历史观的矛盾。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和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日益走近世界历史舞台中心后,美国独家霸权治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持续,转向“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是必然趋势。世界百年大变局最突出的时代特点是: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些矛盾是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力已经与世界生产力融为一体,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融为一体下产生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与原有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的矛盾,也是两种世界历史观的矛盾;它比以往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复杂,谈判妥协的难度更大,但它又极大地关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前途。因此应争取在不对抗、不冲突的前提下改革与开放型世界经济不适应的世界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象就是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即当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两者紧密联系又互相矛盾,如同“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各种矛盾:既有中国经济与世界不同经济体的矛盾,又有各国民族主义经济与发达国家国际垄断资本的矛盾,还有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之间相互勾结利用的矛盾。而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以跨国公司布局,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为纽带的世界性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生产关系之和。这个世界性的经济链条虽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但真正具有组织机体性的国际分工网络只局限于北美、欧洲和东亚。由此形成国际经济的大循环,包括各个区域内部的小循环。这是迄今为

止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面貌。俄罗斯、中东国家和南美石油输出国是这个国际分工网络的外围。

世界经济链条覆盖的局部性是世界生产力发展最主要的矛盾。在跨国垄断资本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很难进入既有经济链条。即使发展中国家获取了分工地位,国际经济链条的分布既不平衡,也不合理。这种状态限制了世界市场的扩大,从而制约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方案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它的内涵是:其一,不颠覆、不取代现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但要加以改革和完善;其二,追求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包容性、开放性,承认并允许内部各种矛盾的存在,并且追求以对话、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其三,致力于扩大世界经济链条和国际分工网络,缩小世界经济链条覆盖面的局限性,缓和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最突出矛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实践与行动,它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是扩大国际分工网络 and 世界经济链条的覆盖面,让更多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扩大世界市场;二是缓解中国内部在融入世界经济中发展的不平衡,扩大中国和世界市场;三是主要方向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坚持“基于而不限于”的原则,构建第三方市场,实行不排外的区域或双边合作。

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有以下缺陷。第一,治理面较为局限。当今世界最缺乏的是贫困治理,还缺乏金融治理、能源粮食治理、网络数据治理、公共卫生治理和地区安全治理。第二,治理民主性缺失。霸权主义作风依然盛行,美国习惯于“一言堂”的作风没有改变。第三,治理包容性不足,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某些区域组织的排外性。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基于何种规则进行治理。美国提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不是指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实际上是指每个国家的“宿命”。维护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就是抓住了当下最主要的矛盾:只要世贸组织不宣布解散,它永远是一面旗帜、一个阵地。因为它的存在就代表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即国际交易需要规则和商业交易道德。只要坚持与维护好这个阵地,就能反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能够批判维护霸权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以及弘扬国际政治中的民主理念和多边主义。世贸组织运行体现了国际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享”的供给与消费方式,其治理理念也是各类区域组织的参照。

#### 四、揭示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

如何继续完善开放型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是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新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新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是提出了在开放型经济领域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以及深化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在这个新发展阶段,要把开放更多引向服务贸易领域,目的就是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而吸收世界上符合社会化、国际化大生产规律的商业规则和制度文明,这是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这不仅是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自身需要,也是参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规则和治理体系的需要,为此要把开放型经济更多引向服务贸易领域。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实施三大举措:第一,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吸引创新要素和资源;第二,把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的开放创新措施加以集成,形成开放型经济的

治理体系,一方面向全国逐渐复制推广,另一方面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法律、法规等制度性基础;第三,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新的国际规则,提供新的国际公共品,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承担中国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大国责任。

## 五、“双循环”重要论述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的科学答案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观点科学回答了中国开放型经济与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基本走向和大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实现的。《资本论》是以英国经济的国内大循环为研究对象的,这也是大国经济体的一般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经济发展都是以内需拉动为主的,而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以往不同的是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以往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建立在中低水平的质量起点上,未来需要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就是要在创新驱动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达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即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外双方都有促进,都有好处,但由于中国国内循环的质量起点不高,所以中外双方的收益也都受到局限。未来中国在高水平国内大循环基础上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就会大大提高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中国与合作伙伴双方的收益。

## 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价值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因此也是当今世界的价值观。它不仅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和价值观,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个行动口号。从当代世界范围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世界各国现实利益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当今世界性基本矛盾、处理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处理经济与政治矛盾的基本方法论和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现实的人类需求相结合,提出实现远大理想的阶段性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今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崇高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它既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又是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为争取全人类利益而提出的现实目标;它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而提出的重大构想和动员口号。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看作虚无缥缈的宗教,而看作现实的符合人类社会利益的、由一个一个行动方案的阶段性目标组成的未来方向。它是未来的,也是现实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首席专家)

# 论人民至上的市场经济

刘尚希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产物。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相比传统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具有磅礴的生命力。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其不同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并以此约束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物为本,资本至上,遮盖了人本逻辑。搞清楚两者的底层逻辑,意在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走好自己的路,使市场经济服务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历史为鉴,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历史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蕴含着一种“创造性破坏”机制。“破”的是旧技术、旧产品和旧结构,“创造”的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结构。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从蒸汽机广泛使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电气化、内燃机广泛使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以及殖民体系和全球市场体系的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电子计算机广泛使用和空间技术发展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再一次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全球经济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的到来,都离不开“创造性破坏”力量的推动。人类文明呈现加速演进的态势。

市场竞争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致使市场经济引领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的生产力依然处于全球发展的前列。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人与自然冲突造成的环境危机、全球竞争抢夺利益带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正在演化的全球大变局,都反映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宿命——可能最终为自己的成功所毁灭(熊彼特)。

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总是伴随各种危机。不断爆发的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在工业化过程中,美、英、日、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环境危机。例如,“八大公害事件”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导致发展不可持续。通过法治、税费改革、技术创新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等措施进行改良,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矫正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得以走出泥沼。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工业化之路的教训是深刻的,遗憾的是,后发展国家仍没有避开这条工业化之路。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两极分化,造就了贫困的无产阶级,催生了生产过剩危机,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危机推动了资本主义改革,从美国罗斯福新政,到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及北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一度大幅度矫正了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消除了绝对贫困,中产阶层扩大,贫富差距缩小。古典自由市场经济转变为“混合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明显加大。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贫富差距又再度扩大,财富聚集和集中的趋势在不断强化。贫富差距向社会深层传导,并在代际之间传导、固化,中产阶层缩小,社会极化现象加重。社会福利制度在选票政治机制的作用下,在一些国家变异为发展动力日渐弱化的“福利陷阱”,财政不堪重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抬头,社会矛盾加剧。全球疫情、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进一

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全球贫困人口不断增多。社会不平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后起之秀,在“干中学”赶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成熟的阶段。“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只有深度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才能走出一条创新之路,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稳致远。

##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以物为本、资本至上

凡是市场经济,都离不开资本逻辑,即在资源配置中“资本说了算”,因为资本是风险的承担者,市场是资本的舞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引进外资开始的,充分利用资本的风险承担功能、要素组合功能和创新功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差别,并非资本逻辑的存在,而在于资本是否成为“主义”。资本一旦成为一种主义,便意味着资本至上,成为一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成为制度体系的核心和底层逻辑。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至上的制度,资本成为社会的普照之光。

当资本成为一种主义,它就会凌驾于社会之上,产生“社会排斥”,即从经济的不平等衍生出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不在于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搞平均主义,而在于遏制贫富代际传递产生的社会阶层固化,保持社会纵向的流动性,使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平等机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自由是目的,人的自由成为手段。由于资本至上,资本追逐的不仅是市场中的利润,而且包括社会权力和政治影响力。资本主义的法治隔断了直接的权钱交易,直接的权力资本化基本上被遏制了,但不妨碍以间接的方式实现资本与政治权力、公共政策,甚至与法律制度的勾连,所谓的“金钱政治”即在于此。当资本成为一种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情况下,“向钱看”就会成为一种文化,资本的支配力量就会超越市场领域。“物”成为发展的目的,而人反而成为“物”和“资本”的附庸。这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中是十分明显的。现代资本主义改进了许多,资本所有者、企业的社会责任加重了,社会的自律性和自组织、自管理也在强化。但“资本至上”并未因此而改变,资本逻辑仍高于人本逻辑。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帮助,社会道德关系、家庭婚姻、思想交流都纳入了资本的逻辑轨道,衍生出“社会资本”“思想市场”“政治市场”等概念,“成本-收益”成为社会通用的行为准则。只要“资本至上”这个底层逻辑依然存在,即使劳资关系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政治附庸于资本的状况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社会的主体依然是资本(财富),而不是人民。在这种底层逻辑支配下,贫富差距、能力鸿沟的缩小仅仅是一种愿望。最新研究显示,在发达国家,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比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一些发达国家曾经想改善这种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但底层逻辑决定其无能为力。资本至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宿命,被自己的成功所打败。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以人为本、人民至上

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资本、是否有资本逻辑、是否有私人资本、是否有私人所有权,而在于人本逻辑是否真正成为主导,人民至上是否成为法律、制度和政府行为的底色,每一个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否成为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与“资本”成为“主义”相对应,“社会”成为“主义”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党的领导和法律制度规定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应是基于人,旨在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全面发展,财富积累、资本发展都是手段;而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基于物(资本),旨在实现资本的自由和不断增值,人的自由、消费都是手段。不言而喻,资本、私人所有权不是束缚人发展的绳索,相反,是促进人发展的要素和工具,是自由和平等的基础。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自身否定之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必要性,这实质上指出,只要否定了资本至上,私人所有权并不会导致人的异化。社会两极分化、人的异化的根源不是私人所有权,而是资本至上的制度安排。在人民至上的制度体系中,资本和私人所有权是每一个人实现自身发展的工具,是市场经济创新的动力。资本和私人所有权是作为价值,还是作为工具,其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定位不同,决定了社会结构体系的性质不同。这好比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碳元素(C),但由于碳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同,造成了它们的性质不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就在于一方面实现了国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另一方面把过去认为水火不相容的私人所有权包容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形成了基于产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从而造就了中国的两个奇迹——长期增长的奇迹、长期稳定的奇迹。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是平等的,都服从于市场规则和资本共同属性——在风险中增值。以增值为目标,并不否定资本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等于唯利是图。资本一旦不追求回报,无论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就意味着退出了市场,退出了市场竞争,转变为消费性的财产。选择市场经济,让资本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改变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产权,而不再是绝对所有权。这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市场经济有很大变化,源于市场机制蕴含的“创造性破坏”,淘汰了旧的资本组织形式——家族式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于一身;创造了新的资本组织形式——经理层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以社会化的方式呈现——股份制。数字化又在创造新的组织形式,数字资本成为新的资本形态。生产的组织方式从工厂制转向公司制,数字化推动下又进一步转向平台化。无论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其所有权权能都在不断裂变,不断结构化和社会化,不断创新资本在“风险中增值”的方式。金融、资本市场加速了所有权权能的社会化、结构化:从以“占有”为中心转向以“使用”为中心,数字化推动的共享平台的发展更是凸显了这一点,社会生产力由此快速发展。

体现人民至上的经济制度不再是传统的所有制,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产权制度,并由此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国家所有的资源是公共资源,全体人民都有平等机会来获得和使用。一方面,国家可通过所有权获得的资本增值收益来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另一方面,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依靠群众来配置资源、使用资源、创造价值,给每一个劳动者、创业者和创新者积累财富的平等机会,摆脱贫困,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就是“群众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资本掌握在群众手中,就会成为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工具和路径。依法保护好群众的资本和产权,调动其创业的积极性,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所在。

#### 四、以包容性发展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

人民至上、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体现在发展方式上就是“包容性发展”。所谓包容性发展,即每个人的发展是所有人发展的条件,所有人的发展是每个人发展的条件。在经济层面,包容性发展就是鼓励公平竞争,实现所有权中性,消除类似“三门”(旋转门、弹簧门和玻璃门)的排斥现象,并依靠所有人掌握的各种形态的财富资本来推动市场经济发

展。市场经济是平等的、开放的,不仅要对外开放,而且要对国内的不同资本所有者平等开放。在社会层面,包容性发展就是坚持社会平等,消除社会排斥,让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履行同等的义务,人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采取诸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包容性发展,但由于资本至上的本质没有变,资本逻辑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社会排斥现象无法根本消除,实现包容性发展是有限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最有条件实现包容性发展。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基本国情出发,进行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生产积极性,群众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资本,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在新发展阶段,群众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以及群众积累的财富资本得到依法保护和有效使用,这依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最为重要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掌握资本的人民群众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市场经济为人民群众搭建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大舞台,只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制度安排,让人民群众掌握和积累更多的资本,在发展中实现包容就有了条件。要平等保护劳动收入和资本增值,激励创业和资本积累。同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资本组合生产要素功能发挥的障碍,让群众掌握的资本在自由选择和风险中实现增值。

包容性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条件以“人民逻辑”来约束“资本逻辑”,防止其变异为资本至上,凌驾于社会之上,从而产生两极分化。人民逻辑的基本内涵是保障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不产生社会排斥;而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是保护资本合法增值,鼓励资本承担风险组合生产要素,推动创新,以“破坏性创造”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以人民逻辑为主导,两相结合,包容性发展就有了条件。有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人民逻辑的主导地位就有了保障,包容性发展就能得以实现。

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包容性发展的步伐在加快。但我国社会转型滞后于经济转型,存在所有制、社会、经济三个“二元”结构,产生了群体性的能力鸿沟,制约了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推进。为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全面实现包容性发展,我们需要抓好以下几点:一是以产权制度改革破解所有制二元,加快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改革,消除市场分割,推动不同所有权资本的融合发展;二是加快社会改革,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实现从“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给予每个人平等发展的机会,提升每个人的能力,走向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发展;三是以发展逻辑破解经济二元,摆脱原有的只从物质现代化角度考虑问题的惯性,以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通过国民素质(包括健康素质、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等方面)和能力的普遍提升,为“发展”而不只是“增长”奠定更加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人类开始进入数字文明时代,为包容性发展提供了新条件。数字化改变了人和人的交往方式、人和物的权属关系,许多资源从原来的不可交易变得可交易,难以使用的闲置财富也变得可以使用共享,资本的作用范围也由此扩大,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致富机会。数字化与资本结合,将产生新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呈现新特征,同时,也面临“数字鸿沟”的新挑战。为此,推动数字化最重要的是坚持人民至上,要防范“数字资本”产生新的社会排斥。数据确权、平台监管、隐私保护、法治建设等都要超越工业化时代的思维范式,只有与时俱进,我们才能抓住数字革命带给我们的历史性机遇,为民族复兴增添新动力。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学院院长、研究员)

# 从当前世界变局看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想的重要意义

洪永森

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中国经济新发展战略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将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什么样的长远影响?如何进一步完善、丰富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想的内涵,形成一个具有深厚学理基础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体系,用以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经济全球化实践,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使命。本文将基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阐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加快推动建设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想的时代背景

40 多年前,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主动打开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及时抓住了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性产业大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实现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大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作为“世界工厂”以及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供应链三大核心之一,中国目前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生产体系,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些巨大的经济成就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正确性。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以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等为主要治理架构的世界经济体系,其间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曾成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但在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全方位竞争中,“经互会”从未在全球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并且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亡。中国则立足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在冷战中后期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主动融入以西方为主的世界经济体系,从中获得了中国经济建设、国家现代化所急需的资本、技术、管理以及世界市场,充分利用了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经济建设与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驱动力。在过去 40 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及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并不是凭借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是通过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有效利用了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依靠亿万人民的辛勤劳动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一

方面,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特别是西方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相对比较自由的大流动。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哪里利润高就流向哪里。与此同时,虽然各个国家的劳动力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特别是制造业外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包括发达国家工人和发展中国家工人在内的全球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这种竞争使发达国家工人相对资本的地位与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害。由于这些原因,在世界范围内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形成资本与劳动日益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西方国家表现得特别明显,从而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美国的“华尔街运动”、英国“脱欧”、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都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逆全球化不仅给西方国家内部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其矛盾也“外输”到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身上,对中国的国际经贸环境形成了不利的影响。例如,长期困扰中美经贸关系的“美国对华逆差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是美国政府将其国内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矛盾转嫁到中国身上的一贯操作。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大幅度提高对华关税之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有增无减,这充分表明真正有问题的其实正是美国自己。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开始比较大规模地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本与资源配置,难免与西方垄断资本特别是西方跨国企业形成对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的竞争。在全球化时代,如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一起形成了一个全球竞争性劳动力市场那样,中国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也开始形成一个全球竞争性资本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在加入 WTO 之后,中国经济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移动。与之前的历次工业革命不同,在当前第四轮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不仅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在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某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和技术创新的快速进步,使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感受到巨大的竞争压力。美国因此开始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并且与其盟友一起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脱钩,企图重建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全球供应链与全球产业链,在一些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 40 年多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国际环境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正面临一个百年未遇的世界大变局,需要认真加以应对。

## 二、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双循环构想首先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内需上,这是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市场规模的约束,中国实施沿海开放发展战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积极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特别是在加入 WTO 之后,中国外贸高速增长,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外需推动力已不如之前强劲,这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地缘政治冲突等的影响,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逻辑结果,尤其是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劳动力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已不具有优势。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进一步产生深远影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外贸的一个主要目的地是向欧美地区输送最终消费品。随着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国内消费市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将不断增长,因此,适时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有其经济逻辑必然性。中国拥有 1.54 亿市场主体和包括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 14 亿人口所形成的庞大内需市场,能够托底支撑一定的内生性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所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与底气。

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及俄乌战争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撕裂与大分化等原因,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70 多年来,新中国经济建设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与工业体系,这是中国经济能够经受国内外各种重大冲击的根本保障,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等冲击。近三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面前一枝独秀,率先恢复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拥有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供应链。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能不受各种外来冲击的影响。在开放环境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对冲将来可能出现的更大冲击的重要保障。2022 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在水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全面封杀俄罗斯经济,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创。例如,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各种贸易制裁,将俄罗斯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SWIFT,导致俄罗斯进出口额锐减,迫使俄罗斯在与其全球贸易伙伴的经济往来中处于劣势,严重影响市场预期;而大量西方跨国企业撤出俄罗斯,导致俄罗斯出现了空前的资本和人才外流,甚至有可能造成大规模失业。从这一点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构想,将能够使中国主动、从容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严重挑战。

随着中美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两国在关系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高科技与关键产业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在美国推动高科技和关键产业领域与中国全面脱钩的背景下,中国之前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已不再适用,必须走自主技术创新的道路。自主技术创新需要巨额投入,需要广阔应用场景与强大市场的支撑,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有助于自主技术创新,实现以内生性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需要强调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不要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之所以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因为国际循环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逐步降低,而且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针对中国的“去全球化”逐渐增加。但是,过去 40 多年的实践表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驱动力之一。中国不可能重回封闭状态下去搞经济建设,对外开放是一个基本国策,而且只能越来越开放。只有不断扩大开放,才能打破美国企图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图谋。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只要中国继续扩大开放,任何西方资本都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因此西方跨国公司将不得不在价值观贸易、供应链安全和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企业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

### 三、如何构建高水平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萎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减弱等三大冲击。在需求不足的形势下,应

该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制定各种有效政策,有效扩大内需,尽快恢复和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区别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优势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两只手同时发挥调节作用,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或其他缺陷。过去几年来,一些政策在出台前没有经过认真调研、充分沟通和科学论证,匆忙出台不久便又取消或改变,让市场主体无所适从,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同时,不同政策之间有时没有充分考虑其系统性与协同性,导致出现冲突和矛盾现象,没有办法实现制定政策的初衷。这些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广大市场主体的预期与决策,影响政策的有效性与精准性,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已经得到关注并纠正。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与趋势没有变化,应该加强决策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尽量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尽量接近潜在经济增速,以推动国内大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迫切需要一个高效率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让市场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有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要素流动性与资源配置效率仍有提升空间。如同外贸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那样,内贸也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例如,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额大于欧盟整体的对外贸易额。一个高效运作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构建统一大市场必然要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顶层设计,坚持系统思维,坚决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政策障碍与壁垒,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作用,鼓励和推动地方之间的良性竞争,并在地方良性竞争中不断进行整合,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水平与效率。

如何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实现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课题。应该充分发挥中国超大经济规模的优势,进一步开放市场,用中国庞大的市场推动国际循环。特别是发挥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规模优势,以此为杠杆,积极扩大进口和吸引外资。这既可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世界各国经济与中国市场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更加离不开中国市场,借此推动重塑中国与亚太产业链与供应链,巩固并维持中国作为亚太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核心地位以及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三大中心之一的地位。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进第三方合作,促进多方互利共赢,营造相对友好的国际经贸环境。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排除在特定时期、特定行业、特定地区以国际循环为主。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三年中,中国及时抓住全球供应链受阻的契机,充分发挥了自身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供应链核心之一的优势,实现了对外贸易高速增长,支撑了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的迅速恢复与增长。40多年来,沿海一些地区,如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经济区,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供应链之中,应该巩固与利用这些地区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而获得的国际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循环,确保这些地区乃至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